



1957.12.14

43
14
145

153
154

7 228
8723

幸福家庭



镜前的维纳斯(油画)

[西班牙]委拉斯开兹(1599—1660)

你肯定是宇宙的情种
小天使是你心灵的赋
你的美一直醒着
却教世代爱美的人们醉着

——金马



北京摩托车制造厂

DF-250型两轮摩托车



我厂生产的 DF-250
两轮摩托车是恢复中的
产品。它的前身是我厂1965
年以前曾生产的长城牌
50B型，长城牌440G型
40Y型竞赛摩托车，并在
第二届全运会上取得优异
成绩。



049853

注 意

- 1 借书到期请即送还。
- 2 请勿在书上批改圈点折角。
- 3 借去图书如有污损遗失等情形须照章赔偿。

京卡0701

厂址：北京东直门外新中街甲12号

电话：445891 484331—341 电报挂号：0836

大用
恢
立，
大
两

049853

Z 228
8727

京电力大 00015239

代编者的话

我国许多人家传统营造法式的宅门或影壁上，喜欢张贴和镌刻“福”字，或示以福望南山，或申以福气满门，或祈以福星高照，或盼以福至心灵。招人咂摸滋味的是，不论是唯物论者，抑或是唯心论者，大多都怪疼爱这个福字儿的；即使生活得暂时还不那么有福分的人们，也时常高兴借它讨个吉利儿。

尚不晓得世上是不是存在过福气得再也没法子福气的家庭，可谁都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即使那幸福之门里装满了“玫瑰色的梦”，即或那“欢乐窝”中发生的悲哀也异乎寻常，譬如说属于那种“天鹅绒式的悲哀”吧，总也还是有那么一点悲哀，正如从许许多多外观很是美满的家庭中所传出的信息那样。说来也怪有趣儿，即使在大多数伦理关系正常的家庭中，幸福和痛苦也有时象在跑接力赛，有时却又象是在唱“二人转”。但是，无论是处于上述哪种状态，痛苦所扮演的并不总是消极的角色，反而往往激发着爱的深化。同时，所谓幸福与痛苦的感觉，又与人们对主客观状况的调节能力与辩证认识能力大有关系。有的社会学家风趣地把人们对幸福的期望——期望值譬如分母，把实现既定愿望的满足程度——实现值看作分子，于是，期望值越大，实现值相对越小，人们越不容易满足；期望值越小，实现值相对越大，人们越容易获得满足。这就是为什么刘姥姥偶尔有幸得大观园会受宠若惊，然而生活在大观园里的主人们却又时常觉得不幸的缘故吧！丢下其他因素不提，单就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来说，其间的差距实在是相去远矣！这还只是就常人对幸福和痛苦的客观存在方式和追求方式来说的（这里无意反对人们应有远大理想和幸福追求，而只是从辩证意义理解幸福和痛苦这对矛盾），如果从不同的精神境界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更为深远的涵义了。关于这，古往今来的哲人们看得十分透彻，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幸福是在于为别人生活”（列夫·托尔斯泰语），“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到别人得到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鲁迅语）。在他们看来，幸福是无私奉献的同义语，而由于无私奉献导致的痛苦又与幸福等价；甚至可以说，只有从无私奉献中体验到的幸福才富于真正甜蜜的人生意味。这也就是说明，痛苦和希望才是构成幸福的一对真正恋人，经受不住痛苦磨练的人，那希望十之八九难免落得“单相思”。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很是赞同李霁野先生在“试谈人生”一文中曾经说过的一席话：“有些人愿意生活中只有快乐，只有幸福，对于痛苦却畏如蛇蝎。这和天天吃糖果过活的人一样，若是能活下去的话，才不要坏，胃口也不好。……不敢深味人间苦的人，也不能深味人间的快乐。……痛苦是净化我们生活的火焰，想生活有深度的人，不怕在火焰里燃烧！”

不过，需要补充一句的是，在我国，我们坚信人为制造的痛苦将会越来越少，而有助于家庭获得稳定幸福的因素会越来越多，这倒是一定的。

这得托福于我们的党。

司马云裳



《幸福家庭》栏目 《父母必读》1986年增刊)

福 (代编者的话)

秦怡之路 (中篇传记文学·续一九八五年第一集)

合欢花谱

闹市人家双属玉——小屋里飞出甜美的歌——神仙伴侣——初恋——北海情话——爱的小夜曲——葡萄架下话家庭——一对幸运儿……

· 并蒂樱(20) 爱的诗(28)

天伦之歌

千磨万击还坚劲——匆匆的剪影——小岛人家——她颤巍巍走在钢丝上——不是华灯初上时——“龙须沟”址访故人——“玩茅人坡”——父子情的曲线……

灯火阑珊(42) 海峡两岸(58) 侨眷素描(62) 特区掠影(66) 海外赤子(67) 民风琐谈(68) 八仙桌旁(75) 稻香村舍(76) 神游故里(84) 治家艺术(88)

现代生活

为了社会，为了家庭——衣料的选择与人体健康——西餐的规矩——整传——几种能治病的蔬菜——家庭如何配制补血饮料——美酒壮君行——猫耳拨鱼实且华——酱和家常菜——扩大小居室的窍门——窗子与窗帘——巧用灯具，居室生辉——对老年人的忠告——少女健美锻炼——在性生活中女性能采取主动吗？……

家庭的新伙伴(94) 衣着穿用(96) 烹饪技术(100) 西餐入门(101) 传统菜品(104) 食疗小集(108) 粥品专论(110) 饮料风味(112) 名店琐话(118) 家常菜(121) 各地风味(122) 居室料理(124) 声·光艺术(136) 家用电器(142) 长寿果(143) 健美之路(146) 福音殿(152) 旅游观光(154) 灯下话旧(164) 夜读偶拾(166) 蒔花小记(168) 性生活咨询室(170) 你好,小宝贝(172) 伴鱼记趣(174) 书法篆刻(175)

文 艺 美 食

退休（小说）——贝多芬和他的《月光奏鸣曲》——与友人谈画录——抚今思昔话《红岩》

体 坛 大 观

“运动皇帝”——现代五项——女子足球运动将风靡全世界——人们叫他“东方旭”

体坛新事(184) 名将之家(186)

名 城 闹 市

尼罗河畔的明珠——开罗——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法国的见闻

世 界 见 闻

丘吉尔的忠实助手、夫人克莱门蒂娜·霍齐娅——希望之棺——有限空间和无限勇气——五胞胎传奇——别开生面的儿童饭馆——西欧青年点滴——被打入“地狱”的“黑色仙女”

(本集作品细目见 208 页)

编辑：《父母必读》编辑部

出版：北京出版社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五十一号)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封面、彩页：百花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3印张 360,000字

书号：17071·48

期刊登记证：056 定价：2.00元



秦怡之路

学国 晓杰

① “我最喜欢打腰鼓……”

1949年5月27日，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终于在人民解放的炮火声中获得了新生！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浦江两岸，旗如海，歌如潮。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劳动群众涌上街头，尽情地唱呀，跳呀，呼口号呀，以人世间最纯朴、最激情的方式，欢庆自己的翻身解放，讴歌共产党的英明伟大……

我们的主人公秦怡，这时年方二十七岁。此刻，她手执彩色的标语小旗，兴高彩烈地跻身在市民群众庆祝上海解放大游行的行列，胸中充盈着自由舒畅的翻身感。依旧是狭窄的柏油马路，依旧是鳞次栉比的灰色高楼，可现在的感觉怎么不一样呀？哦哦！怎么能一样呢？！演员被歧视为“戏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恢复了人的地位；流氓兵痞捣毁戏院，恣意亵渎文明的悲剧再不会重演，笼罩在心头的压抑和恐惧感

也随之烟消云散，真象那首在解放区流传的歌儿唱的那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秦怡行进在群众游行的队伍中，亢奋，激动，思绪万千，眼前呈现一片迷人的玫瑰色。

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秦怡，早在上海解放前夜，就在我地下党员、戏剧家陈白尘等人的鼓励下，赶排了一出反映工人组织“护厂队”，保卫工厂生产设备和财产，同反动势力英勇斗争的话剧，她在剧中扮女主人公，李纬演男主人公。上海刚解放，他们就将这出新戏推上舞台，献给英雄的工人阶级。不久，在陈白尘的带领下，秦怡又接连排练了反映妇救会克服困难支援前线的《把炮弹打上去》和一出歌颂农村土地改革的活报剧，并走上街头演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情赞扬和欢迎。在沸腾的翻身日子里，秦怡全身心地投入演出，不知疲倦，不计报酬，她象一个活跃的音符，在欢庆上海解放的华彩乐章中，找到了自己的最合适的位置。

上海是我国电影的发祥地。这里影星云集，设备先进，从二三十年代起，一直是我国电影生产的重要基地。因此，上海解放不到两个月，人民政府就决定筹建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振兴和发展我国的电影事业。当时，我们党把未加入私营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们组织起来，从政治和生活上关怀他们。组织上让年轻而有影响的秦怡担任学习组组长，黄宗英担任福利组组长。后来妇联成立，秦怡在电影厂又从事妇女工作。并当选为上海市妇联执行委员。

秦怡是个厚道、随和而又负责任的学习“官”儿。

清晨，她早早就赶到位于巨鹿路的浦东大楼，带领演员们学习时事政治，讨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神勇的人民解放军对蒋家王朝的残兵败将穷追猛打，正向南方各省节节挺进；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不可逆转的政治形势令人鼓舞。而毛泽东同志阐述的全新的文艺观，更使这些长期生活在蒋管区的演员们顿开茅塞。为什么演戏？为谁演戏？怎样演好戏？这些属于文艺ABC的问题，秦怡过去从未深入思考过，现在毛主席把它提到党的事业和阶级立场的高度去剖析，去论证，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她从《讲话》中领略到演员把汗水洒向银幕和舞台的真正价值，认识到演员在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肩负的神圣使命。

解放初期的上海，干部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秦怡每月只领二十元钱的生活津贴。即便如此，秦怡已很满足，因为她从这为数不多、却是早涝保收的津贴金中体味到，今后再也不必为全家人的温饱而操劳担忧了。

上影厂的筹建工作，进展顺利而迅速。为迎接新厂的诞生，演员们纷纷排练各自拿手的节目，准备在庆祝晚会上大显身手。有的朗诵，有的演双簧，有的唱京戏，有的唱沪剧，而秦怡却投入了自己并不擅长但十分喜爱的腰鼓舞的排练。她同女演员莫愁、男演员孙永平等一伙年轻人组成了腰鼓队，利用每天晚饭后的业余时间认真琢磨打腰鼓的技法、节奏和舞蹈动作。

“咚啪——咚啪——咚、咚、咚啪”，震耳的鼓声和着欢声笑语，在排练场上回荡。秦怡打着腰鼓，时而躬膝对练，时而扬臂独舞，显得轻盈而活跃。这鼓声吸引了周围的演职员，连年近四十的吴茵大姐，也一改银幕上老妇人的形象，象个姑娘似的，与秦怡等一起学习打腰鼓的艺术。

鼓声阵阵，汗水涔涔。秦怡一丝不苟地学习这门在中国民间流传的艺术技巧，有时累得手臂酸疼，两腿沉胀，连爬楼梯都没有劲儿，但她还是坚持敲啊，打啊，一刻也不愿歇息。她说：“我很喜欢打腰鼓，因为它最能表达一个人热烈奔放、翻身自由的情怀了。”

深秋的一个夜晚，在梵航渡路礼堂举行的庆祝上海电影制片厂建厂晚会上，秦怡打着腰鼓走上舞台，与腰鼓队的同伴们一起表演了精彩的腰鼓舞。“咚啪——咚啪——咚、咚、咚啪”，秦怡觉得自己敲的腰鼓是青春的鼓，生命的鼓，事业的鼓；她将循着这纵情的鼓声，走上人生与事业的新的历程。

2 北方农村的新女性

胶东半岛上的崂头村，是莱阳境内的一个贫瘠的村落。这里丘陵绵延，地势起伏，村民们使用的主要运输工具，还是两千年前先祖发明的独轮车。初春的

一天下午，在村外一条细长的坡路上，一个梳着长辫子的农村少女推着一辆装满石子的独轮车，“吱扭、吱扭”地向坡上走去，独轮车前面，有个剪着齐耳短发的青年妇女，躬腰背着绳索在使劲拉车。她们一前一后，吃力地将独轮车推上坡顶，不料在下坡时，前面那个妇女依然把绳子拉得紧紧的，致使装满石子的独轮车飞也似的向坡下冲去。“大姐！快松绳子！”后面那个驾车的姑娘惊叫起来，两手死命地捏住车把，力图减缓独轮车下冲的速度。“快别拉了，要翻车压着你啦！”

那妇女听到叫声大吃一惊，慌忙松开绳子，只见独轮车在惯力的推动下，擦着她的身边呼啸闪过，冲到很远的地方才得以停下。

“好险啊，差点儿没压着你。”驾车的姑娘用衣袖抹了抹额上的汗珠，笑着对赶上前来的妇女说。

那妇女感激地望着姑娘，说道：“多亏了你，否则后果真不堪设想。我真羡慕你这么能干！”

“这算啥呀？你们大城市来的干部见多识广，那才叫能干哩！”姑娘听到赞美，脸上泛起了红晕。她抬头看了看天空，操起车把说：“天色快晚了，咱们回村吧！”

“吱扭——吱扭”。两个年轻女子，一前一后驾着独轮车向崂头村走去。那前面拉车的妇女，是上影厂的演员秦怡；那后面推车的姑娘，是秦怡房东家的女儿，也是秦怡将要在故事影片《农家乐》中扮演的女主角——腊英的生活原型。

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49年11月正式成立。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宣布组建《农家乐》摄制组。执导这部影片的张克，物色了张伐、卫禹平等优秀男演员参加摄制组，同时选定了秦怡担任《农》剧的女主角——农村姑娘腊英。

秦怡在解放前共拍摄了十部影片，主演过近二十台话剧，曾塑造从绝代佳人到纺织女工等古今中外各种妇女的形象，但对农家生活并不熟悉。她曾扮演过诸如从农村流落到城市雇佣的小大姐、老妈子一类社会底层劳动妇女形象，但那往往是形似大于神似，并无多少真切的生活感受。《农家乐》通过贫苦农民新旧社会生活的强烈对比，反映了翻身农民努力发展生产，走勤劳致富道路的热情和积极性。女主人公腊英是解放初期农村的新女性，如何塑造这样一位农家女儿的完美形象，秦怡心中没有底。所以，当《农家乐》摄制组在上海重温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决定到胶东半岛农村体验生活和选取外景时，秦怡欣然前往。她决心寻找现实生活中的腊英，探索和体验这位农家姑娘的生活、思想和感情。

来到崂头村，秦怡发现，这里虽然是老解放区，同时也是穷乡僻壤。春暖花开时节，大自然被点缀得万紫千红，但老乡家粮食紧缺，许多村民不得不去采摘路边的榆树叶充饥。当时，摄制组的成员分散在附

近各个村庄，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热情的房东为了款待大城市来的客人，在碾碎的榆树叶中掺了点玉米面，烙成一张张黄绿饼当饭，而没有象往常那样熬成稀粥。当秦怡第一次吞咽这种没有油星的饼时，心中涌起一阵强烈的冲动：可敬的老区人民，你们的日子过得多么艰难啊！然而，你们还是那样乐观，笃信在铲除了剥削和压迫之后，通过自己的双手，能够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能够过上富裕的日子，这种坚韧和自信、这种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共产党的信赖，又是多么可贵啊！

秦怡最初住在牛棚里，不久便搬进一户贫农家中，同房东的女儿睡一个炕。她们每天清早一道起床梳妆，一起到田间耕地锄草，一块儿跳进猪厩起粪肥，俩人形影不离，亲如姐妹，连晚上睡觉都钻在一条被子里。自从这次推车运石子发生险情之后，秦怡每次下地只是跟在姑娘后面干，不让姑娘为她分神操心，同时注意观察姑娘的喜怒哀乐和行为举止，揣摸她的内心世界……

秦怡在那里只度过了短暂的几十天，但这儿的劳动与生活，却使她终生难忘。她在这里发现了腊英应该具备的质朴、热情、勤劳、能吃苦等优良的个性品质，找到了一个演员扮演腊英的“感觉”，同时真正体会到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深入生活是演员塑造当代主人翁——劳动者艺术形象的必由之路。

1950年秋，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农家乐》在各地公演。秦怡塑造的当代农村新女性——腊英的形象，给广大观众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秦怡扮演农家姑娘的成功，激动了导演瞿白音。当时，他正着手组织班底，执导一部也是农村现代题材的影片《两家春》。导演邀请秦怡担任片中的女主角坠儿。

《两家春》是一部歌颂新社会的婚姻自由，鞭挞旧社会封建办婚姻的影片。主要描写坠儿在父母包办下“嫁给”了年仅五岁的小丈夫（王隆基扮演，后来他曾在影片《三毛流浪记》中主演三毛），十分苦恼和不满。在当地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几经曲折，她终于解除了与小丈夫的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同相爱的农村青年结成了美满姻缘。秦怡接到剧本后觉得，坠儿与腊英都是北方农村女青年，衣着也差不多，劳动内容相似，怎样才能避免这两个角色的雷同呢？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好的演员应当善于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就象画家绘制不同的画卷，科学家论证不同的猜想和假说一样。秦怡是个富有创造精神的性格演员，她在酝酿角色时，经常从人物内心世界出发，提出一些对刻画人物性格特征有益的新建设。

在拍摄现场化妆时，她对导演说，“我想在坠儿的嘴唇上点一颗黑痣，这样观众就不会把我当成腊英了。”

好主意！脸上多一颗黑痣，更能体现出人物的倔强个性。“好，就这么办！”导演当场拍板。

又一次，在拍坠儿抱着五岁的小丈夫撒尿的内景，秦怡忽然对导演提出：“这么拍，没多少戏。坠儿在给小丈夫把尿的时候，肯定是不情愿的，她越想越烦，越想对这门婚事越恨，应当拍她在给小丈夫把尿时，气得把小丈夫摔在地上的镜头，以表现她内心的愤怒与反抗情绪。”导演当然是同意的。

在拍这场戏时秦怡完全进入了角色，小丈夫被摔得哇哇地哭起来，但这正是编者、导者和演员所追求的艺术效果。

“这一个”坠儿和“那一个”腊英虽然同是农村姑娘，但性格特征有着明显的区别。

3 送你一枝马兰花

1954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筑工地上一片沸腾：汽锤有节奏的“嘣！嘣！”打桩声，推土机的“突、突”轰鸣声，载重卡车的“嘀、嘀”喇叭声，以及建筑工人嘹亮的号子声、吆喝声，汇成了一曲气势宏伟的新中国建设交响乐。

在建筑工地的一角，访问苏联刚刚归来的秦怡，此刻穿着蓝色背带工装裤，高高地坐在一台推土机的驾驶室内。她熟练地握着操纵杆和方向盘，时而放刀前进，时而收刀后退，一会儿左拐，一会儿右转，……她驾驶得还蛮象回事呢！

秦怡是体验生活来的。她自拍完影片《农家乐》和《两家春》之后，曾于1950年底随上海文艺工作者组成的土改工作队，奔赴风雪迷漫的江淮平原，在距皖北宿县七十里地的一个村庄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她是怀着身孕下乡的。由于旅途的劳顿未消，又加上在农村通宵达旦地从事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斗争反动地主而造成的疲累，导致了她的流产，因而不得不返回上海。从那以后的三年间，她参加了上海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中，领衔主演了话剧《英雄的阵地》。1954年，苏联举办中国电影周，展映了《白毛女》等影片，秦怡和张瑞芳等作为我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应邀访问了苏联。在苏联期间，秦怡一行出席了中国电影周的各项活动，参观了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等城市，受到了苏联人民和电影工作者的热情款待和真诚欢迎。她满载着苏联人民的友好情谊回到祖国之后，立即接受了在影片《马兰花开》中扮演女主人公马兰的新任务，于是风尘仆仆地赶到长春，在这个全国瞩目的重点建设项目的工地上当上了女推土机手。

《马兰花开》叙述了工人家属马兰不甘心整天在家围着锅台转，成为丈夫的附庸，毅然来到建筑工地学习驾驶推土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经历。现实生活中的秦怡，虽然不同于银幕上的马兰，但她在长

春学开推土机的遭遇，却与当初的马兰极为相似。那时，她在摄制组的驻地，离建筑工地较远，而且交通不便，每天早晨要步行一个小时才能赶到工地。当时工地指挥者忙着调兵遣将抓工程进度，无暇顾及这些演员。秦怡到工地报到的那一天，建筑机械队的负责人把她领到一台推土机旁，指着驾驶台上的司机说：“秦同志，您以后就跟着这位师傅学吧。”

那师傅年近半百，重男轻女的思想颇为浓厚。他瞟了一眼站在面前的秦怡，不冷不热地招呼：“上驾驶室来吧！”

秦怡神采飞扬地钻进驾驶室，满以为师傅会把着手耐心教她。谁料想师傅一古脑儿讲了方向盘、挡位、油门、煞车等部件的位置和操作要领后，说了一句“开推土机不难，练熟了就成”，竟独自跳下推土机去抽烟了。秦怡以前在商业专科学过会计，下农村学过庄稼活儿，从未学过机械和驾驶原理，当她单独坐在司机位置，面对着陌生的机件操作时，真有点心慌意乱。好在她年轻，精力充沛，记忆力很好，按照师傅指点的那些驾驶要领反复练习，总算把推土机开动起来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秦怡每天早早地来到工地，象个小徒工似地加水、擦车，等候着师傅上班，但姗姗来迟的师傅，每天上班只教半个小时技术，就不见踪影——蹓到不知什么地方去抽烟、聊天去了。有一次，推土机遇到故障，怎么也发动不起来，秦怡急忙求助于师傅，可跑遍工地，也未见师傅的影子。有人看到她那焦急、疲惫的神色，奇怪这个姑娘（其实她已三十二岁）怎么干活如此认真、卖力。

“这姑娘怎么了？”

“她是演电影的，到这儿来学开推土机，找不到师傅了。”

“怪不得团团转。开推土机是咱们男子汉干的活儿，女的哪行？！”

“演员嘛，学个样子就行了。”

秦怡是个要强的女性。小时候，妈妈说她笨，有些事怕她做了闯祸，不让她做。这时秦怡就偏要去做。她在工地上听到这些藐视妇女的闲言碎语，真是火冒三丈，想甩手不学了！可冷静思忖，未来影片中的马兰不就是这样的处境吗？马兰学开推土机的时候，也经常失败，还遭到年轻调皮的小师傅们的嘲笑；她参加工作以后，下班晚了，丈夫就要在家生气，连饭也不做，就等着她回家做饭呢！……秦怡这么一想，怒气全消。她觉得，自己对女推土机手马兰这个形象的理解更深了，对这个角色的心理活动，也有了真实的体验。所以，尽管这样，秦怡每天下班时又累得全身瘫软无力，但她还是坚持上工地，学会了开推土机。

长春的工地劳动生活，为秦怡塑造马兰的形象增添了新的光彩。拍摄马兰开推土机的镜头时，秦怡不要替身；她还把马兰受委屈和发愤图强的情绪演得入木三分。这年冬天，《马兰花开》拍完以后，秦怡高兴



地说：“这部影片我还是蛮喜欢的。”

尽管秦怡蛮喜欢《马兰花开》和自己扮演的角色，著名的电影家夏衍也肯定了这部影片和秦怡的表演，但这朵马兰花开得不久便被送进了资料仓库。原因很简单——因为马兰当的是推土机手，参加的是重工业劳动，而当时“老大哥”的苏联不提倡妇女参加重工业建设，在一切都以苏联为榜样的年月里，这部影片的命运自然就不妙了。

秦怡对《马兰花开》的遭遇虽然不理解，而且有点遗憾，但并不沮丧，因为这部影片在那些有幸先睹为快的观众中还是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还因为她未及思考这些微妙原因的时候，已经深入上海一家纺织厂去体验生活了。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秦怡对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热火朝天的生产建设第一线去，是真诚的，积极的。在纺织厂，她先在整理车间和细纱车间劳动，而后又到织布车间“跑弄堂”，在令人目眩的一排排织布机之间巡回监视，及时发现并将那些断头的经纬线接起来。她每天劳动八个小时，不停地在震耳欲聋的车间走动巡回，精神高度集中，以防出次布。当车间里下班的红灯亮了以后，工人们纷纷去洗澡、回家了，而秦怡还要留下来同厂里的文艺积极分子一起编节目，指导他们排戏和演出。这样的劳动生活持续了九个月，秦怡累得精疲力尽。但她看到工人姐妹劳动强度很大，却能长年累月坚守生产岗位；他们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而工资却不高，不禁对他们产生了由衷的钦敬。她想，如果让自己一辈子在纺织厂挡车“跑弄堂”，自己肯定活不长，说不定两年就把身体拖垮了！她不敢奢望自己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她象五十年代中期从事脑力劳动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纯真地承认：自己确实还没有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4 从篮球女将到清代渔妇

我国较早的彩色故事片《女篮五号》，是一部描写我国新旧社会两代篮球运动员的事业与爱情的戏。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成立《女篮五号》摄制组的时候，青年导演谢晋把女篮五号的母亲林洁这个重要角色，分配给了时年三十四岁的秦怡。

影片中的林洁，是解放前上海著名的篮球女将。影片不仅展现了她的坎坷人生和爱情上的悲欢离合，而且有不少她登场参赛和练球的镜头。秦怡是在上海滩长大的，旧社会的不平事见得多了。她不仅理解林洁的内心世界，熟悉那个时代的生活，而且掌握了一定的篮球技术。对于篮球，秦怡并不陌生。她早在少女时代就参加过中学女篮校队，虽然不是篮球名将，但也算是篮球场上引人注目的人物。参加摄制组后，秦怡穿上了猩红色运动衣，经常出现在上海风雨操场，练习跑步投篮和弹跳摸高；不久又随摄制组来到首都，在国家体委新建的北京体育馆，过了一段正规的篮球运动员的生活。在那里，一切都按照女篮队员集训的要求和生活节奏进行：每天清晨五点多起床出操，七点半淋浴、早餐，接着是练球训练，上午十点钟休息，下午要接着训练，伙食也按照运动队的丰盛标准安排。秦怡和从正规女篮借来演戏的姑娘们一起训练、学习和钻研角色，生活过得轻松而愉快。“这一段运动员生活很有意思，它使我在塑造林洁这个人物形象时有一种丰富感，产生了一种创作欲望。”

《女篮五号》是谢晋青年时代执导的第一部力作。秦怡扮演的林洁，感情细腻而真实。从银幕上看，当中年的林洁在医院意外地遇到往日的情人田振华教练（刘琼饰）时，猛然间心潮澎湃，神迷意乱，她在年轻的女儿面前不好意思，脸上真的泛起了红晕。当她悲伤哭泣时，眼圈、鼻翼也都红了，这在彩色影片中表现得没有半点虚假。秦怡和刘琼的精彩演出，始终抓攫着观众的心。这部影片在1957年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中荣获银质奖章；它还被送到埃及，在中国电影周展映，并获得声誉。秦怡也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再度访问了苏联以及芬兰、埃及等国。有一些电影行家认为，《女篮五号》作为一部描写运动员生活与运动的体育片，雄冠我国近三十年，至今还没有一部体育故事片的水平超过它。秦怡对《女篮五号》的评价是：“这是一部雅俗共赏的片子。它反映了老一辈和青年一代运动员的生活，有新旧社会对比，有感情的东西，又有打球的内容，它把生活、事业与爱情融汇揉合在一起，‘花色品种’比较齐全，所以从领导干部到普通老百姓都喜欢看。”

秦怡继《女篮五号》之后，曾在影片《铁道游击队》中饰演微山湖畔抗日妇女芳林嫂。芳林嫂的戏不多，但观众还是对秦怡扮演的这个角色印象颇为深刻。在

拍摄芳林嫂拿着手榴弹追赶日寇（陈述饰）那场戏时，秦怡一边追赶，一边眼睛紧紧盯着在前面张惶逃跑的陈述的脚跟。她在慌乱中，把没有拉线的“手榴弹”扔出去，正好砸中了陈述的脚后跟。“手榴弹”没有爆炸，秦怡眼看着“日寇”从眼皮底下逃去，真的气乎乎，难以自禁。这场戏一个长镜头就完成了，导演、演员和摄制组其它同志皆大喜。

影片《铁道游击队》在全国放映后，各地影院的上座率都很高。游击队员弹唱的“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的歌声，也随之在群众中传唱开来。然而，秦怡谈到这部电影时，却坦率地告诉笔者：“这个戏我并不太喜欢。”笔者未及细问详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秦怡一定觉得芳林嫂的形象塑造成影片的某些部分，尚有同她的艺术追求相背驰的遗憾。

在同一时期，秦怡还在彩色故事片《林则徐》中扮演了一名侠义爱国的渔妇。这部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优秀影片，由郑君里导演，赵丹主演，渔妇只是一个配角，但秦怡演得十分认真。秦怡小时候曾亲眼看到姑姑、姑夫一家抽上鸦片之后，门庭是如何败落的。

这两个长辈原先容光焕发，沾上鸦片之后，变得瘦骨嶙峋，脸色灰暗，象连环画中的青面鬼，他们因抽鸦片而倾家荡产，姑姑经常回到娘家来要钱花。所以秦怡对鸦片的痛恨和对禁烟的拥护，丝毫不亚于那位渔妇。她与角色之间有着心灵上的共鸣。

拍外景的时候，摄制组住在林则徐当年禁烟的地方——广东虎门海军预备学校。导演郑君里写完分镜头剧本之后，每天都组织演员们阅读剧本，理解角色，交流创作的构想；在每个镜头开拍前，他都向演员们阐述自己的意图。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为塑造林则徐的形象，把头发剃光一半，蓄起了清代发式。广东天气炎热，他在驻地经常拖着木履，肩上披着一条毛巾，不修边幅，一副不拘小节的邋邋样儿。秦怡在这些兄长面前显得有点“任性”。轮到拍渔妇的戏时，郑君里给她一个玩具娃娃，作为渔妇的婴儿。秦怡为求得真实，一定要导演找一个真正的婴儿来当演员。郑君里没有能满足这个要求，秦怡就气得脸色铁青，拼命地闹，仿佛郑君里是夺去渔妇亲生孩子的元凶。后来，影片仍按导演的意图拍了渔船上的戏，婴儿仍是一个没有血肉的玩偶，秦怡坚持认为：“这不真实！”

在拍摄过程中，也有很真实的镜头：渔妇狠狠地打了洋鬼子一记嘴巴。扮演这个洋鬼子的特邀演员，是在中国福利基金会担任宋庆龄秘书的一位美国朋友谭金邦（译名）。他每天从旅馆骑自行车到拍摄场地，拍片之余向摄制组的同志学习中国普通话，同中国同志相处得很融洽。在拍摄渔妇打洋鬼子耳光的镜头时，秦怡扮演的渔妇完全进入了角色。面对着侵略者，从

心底喷溢出强烈的国恨家仇，她把全部愤怒集中在手掌上，狠狠地朝洋鬼子的脸上打去……这场戏拍完之后，秦怡的感情回到现实生活中，突然感到很对不起谭金邦。因为她把这位美国朋友打得太重了！然而这位美国朋友不但没有抱怨，反而称赞秦怡演得逼真，连声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是呵，在摄制组里，有什么能比演员之间的理解与交流更珍贵的东西呢？！

表现中华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影片《林则徐》，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属于上乘之作，是我国电影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这部影片放映后，受到广大观众和行家的一致称赞。从一滴水可以看太阳的光芒，从秦怡扮演的渔妇，可以看出这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日臻完美的再现生活的本领和对艺术严肃认真的态度。

5 “党的女儿”和狱中的林红

大凡中年以上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五十年代末期那个狂热的“大跃进”的岁月。处处都是土法上马大炼钢铁的“小高炉”，处处都放亩产万斤的农业“高产卫星”，理论家搬出“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语录，实践家就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共产食堂！真是够罗曼蒂克的！为了追赶浪漫的经济形势，影片《红色的种子》摄制组每天掐着秒表拍镜头，最高曾创下一天拍摄一百零九个内景镜头的空前的记录！

《红色的种子》是一部革命题材的影片。它描写抗日战争期间，党员小华奉命潜入敌占区去找地下党联系。她来到预定接头地点小王庄时，这里已被猖獗的敌人化为一片火海。接头的秘密党员不在，小华几经曲折，被商人卖给一个贫苦农民家中作媳妇，在洞房花烛之夜，小华向憨厚的农民陈述原委，晓明大义，取得了这户农民的理解和支持，结果这粒红色的种子就在当地生根发芽，带领群众重振旗鼓，继续同敌人战斗。秦怡在影片中就主演这粒红色的种子——小华。为了“大跃进”，她和孙道临等主要演员，在上影摄影棚内整整拍了三天三夜内景，然后马不停蹄，又赶到苏州等地抢拍了五天半外景，这样整部影片从开拍到停机，只花了八天半的时间！连剪辑、录音合成等制作过程在内，全部影片的生产只用了二十多天时间，秦怡回顾这部影片时说得很中肯：“《红色的种子》不到一个月就诞生了，这部影片观众还看得下去，但艺术上很粗糙！”

在狂热的岁月里，也有不狂热的影片。1959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崔嵬导演的《青春之歌》，就是一部国内外公认的优秀影片。秦怡在这部影片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在国民党监狱中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林红的形象。

秦怡于195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接受了扮演林红的任务。人们在赞叹她的演技之余，

也为她能如此深刻、细腻地把握这位女共产党员的崇高形象而深深感动。那时，她才入党两个月啊。其实，熟悉秦怡生活道路的人们倒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因为远在解放以前，秦怡就直接感受着党的温暖和关怀，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等一大批共产党员以他们恢宏的革命情怀，哺育着秦怡那颗渴求正义、顽强上进的心灵，这种温暖和关怀一直持续到解放之后，是秦怡的思想和艺术成长的巨大精神支柱。秦怡虽然长期曾置身党外，却一直和党在思想感情上水乳交融，可以无愧地说，她是一个名实相副的“党的女儿”。这也正是她作为一个新党员，能够有肉有血地把林红这个形象塑造成为一个心灵挺立的艺术典型的情感基石。

不过，秦怡严谨的艺术风格，要求她不仅仅依靠这可贵的情感基石；尽管有了这个基础，她不难塑造出说得过去的林红形象。作为一个由党的乳泉哺育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当她一旦扑进党的胸怀，她情不自禁地要借助艺术手段为党的光辉形象讴歌。与其说她获得了扮演林红的任务，倒不如说她获得了一次向伟大的党、向广大观众倾诉她对党的美好情愫的机会。她意识到，她与林红虽同是共产党员，但她却没有坐过敌人的牢房，也没有林红那样的成熟的革命经验。为了熟悉那种斗争环境，她大量阅读了《革命烈士诗抄》和《红旗飘飘》等革命回忆录和先烈的诗文，同时注意借鉴周围革命者的斗争生活，努力净化、升华自己的思想与情操。

秦怡曾听过一位在上海工作的老干部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土地革命时期，她被敌人逮捕时，敌人把她的孩子绑在大树上，胁迫她说出党的机密，但这位女共产党员宁死不屈，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结果，气急败坏的敌人当着她的面，用刺刀将孩子戳死在大树上……。秦怡被感动得泪如雨下，心想，天下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亲生骨肉？如果敌人用刺刀杀的是自己的孩子，自己能经得起这个考验吗？……

在北京拍片时，她漫步天安门广场，看到新建的人民大会堂巍然屹立，广场两边的灯柱上，工人们正在安装乳白色的莲花灯罩，不禁浮想联翩：眼前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是先烈浴血奋战的结果！这一切就是活生生的理想！林红视死如归，坚贞不屈，就是因为相信自己倒下之后，千百万人会前赴后继，去夺取胜利，是共产主义理想支撑着她那瘦弱的身躯，所以她才变得如此坚强。渐渐地，她觉得自己就是林红，如果为了今天的胜利和未来的理想，再一次去赴刑场，她也会坦然、勇敢地向前进！

林红的“感觉”找到了，先烈的思想感情理解了。秦怡在拍摄林红与小妹妹林道静（谢芳饰）在狱中诀别那场戏时，她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如何表演，而是完全沉浸在角色中，任凭感觉自然流露与发挥。“我感到浑身发颤，血往头上涌，完全与角色融为一体。为

了不让林道静痛苦，我表现得十分平静。”

影片《青春之歌》在观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响！秦怡扮演的共产党人，成为当时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光辉形象。周恩来总理观看了《青春之歌》后，十分高兴，他希望秦怡今后多拍这样的影片，要电影家们更多地塑造象林红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鼓舞人民前进。

秦怡拍完林红的镜头之后，随中国电影代表团第三次赴苏联访问，在莫斯科参加了第一届国际电影节活动。她访苏归来后未及洗尘，就参加上影演员剧团排练的《大雷雨》的演出；年底又前往云南西双版纳，在徐韬导演的反映我国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摩雅傣》中饰演了女主角米罕。

民主改革前的傣族山寨，盛行着“琵琶鬼”的封建迷信。山寨的反动头人可以无端指责任何良家妇女为“琵琶鬼”，于是这个“琵琶鬼”必须被驱赶到山林中去，她若返回村寨，就要被活活烧死。秦怡饰演的米罕，就是被反动头人诬为“琵琶鬼”的傣族女性。米罕历尽曲折，终于在民主改革中获得了新生。解放军派到傣族山寨的“摩雅傣”——医生，用事实揭露了反动头人的罪行，破除了“琵琶鬼”的迷信，使改革顺利进行，傣族群众获得翻身解放。秦怡在傣族聚集的西双版纳体验生活时，听到不少妇女被烧死的悲惨的事情，她还访问了一位曾被头人无端诬为“琵琶鬼”的老大娘。这位大娘被赶进深山老林独居，既要承受精神上的压抑、孤独和创伤，又要躲避大自然中风雨雷电的肆虐和猛兽毒蛇的袭击，过着比白毛女还艰辛的生活，直到傣乡民主改革后她才得以返回村寨。

秦怡耳闻目睹了“琵琶鬼”的悲惨命运，激起了对反动头人的强烈仇恨。她感慨地说：“头人那么残酷，我恨不得把他们杀了！那里的民主改革真好！”

秦怡在云南靖云县拍外景时，就是怀着对傣族妇女命运的同情和对反动头人的强烈仇恨进入角色的。当米罕被当作“琵琶鬼”驱赶到原始森林之后，她思念刚生下的女儿依莱罕，忍不住悄悄返回村寨家中，给嗷嗷待哺的女儿喂奶。当镜头转向米罕与丈夫告别时，秦怡动了真情，她扮演的米罕猛地扑到丈夫怀里，把“相见时难别亦难”的万端怨绪和惜别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可惜有些精彩的镜头，在影片中被迫剪掉了。）秦怡却忍着难耐的烟熏火燎，拍完了米罕被头人抓住，绑在大树上火烧的镜头。可是秦怡对拍好的镜头不满意，在她的要求下重拍了这场戏。她被近在咫尺的火苗烤着，被卷起的浓烟熏着，导演感动地打趣说：“米罕没有烧死，你可要烧死了。”

秦怡主演的影片《摩雅傣》于1960年公映，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真诚喜爱。一些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朋友看了这部影片后，竟喜欢得手舞足蹈起来。



6 水利工地的女书记

在上海复兴中路秦怡家宽敞明亮的客厅里，笔者曾问女主人：“在你拍过的影片中，你最喜欢的是哪几部？”秦怡答道：“我比较满意的是《青春之歌》、《浪涛滚滚》和电视剧《上海屋檐下》中饰演的角色。”读者对《浪涛滚滚》可能不熟悉。它是1964年拍摄的故事影片，秦怡主演影片中的水利工地党委书记钟叶平。

进入六十年代之后，秦怡曾奔赴井冈山、庐山、杭州、苏州、青岛等地巡回演出了一批自编自导的诗歌朗诵和说唱节目，还演唱过歌曲；1962年，她同赵丹等一起东渡扶桑，访问了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她还曾担任影片《春催桃李》的副导演，并饰演其中的老校长。1963年她在曾掀起轩然大波的故事影片《北国江南》中扮演农村女共产党员银花。这部影片可谓生不逢时。当时理论界的“左”视眼正猛烈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和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所以它一诞生，就立即作为陪绑被扣上了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同“修正主义”文艺挂上了钩，秦怡扮演的银花也被说成是一个只讲人性不讲阶级性的“贤妻良母”，而不是头脑里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的女共产党员。在形而上学猖獗的年代，文艺作品中的女共产党员都不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贤妻良母出现。复旦大学物理系一名大学生斗胆写了一篇《银花是贤妻良母吗？》的文章，同当时挥舞大棒的“左”先生们抗衡，后来文章虽在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但他同时也被追查了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好在他是工人的后代，没有更深的“阶级斗争”背景，结果被戴上“个人主义严重”的帽子。秦怡当时虽有压力，但还没有遭殃，她的真正灾难是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因而她还能集中精力投入著名导演成荫执导的影片《浪涛滚滚》的拍摄工作中去，塑造出一个活脱脱的女

书记钟叶平的形象。

在拍摄《浪涛滚滚》之前，成荫导演认为，秦怡在《青春之歌》中演过林红，现在演水利工地的党委书记，从气质上可以把这个角色拿下来，他希望秦怡能演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党委书记，不要演成观众在银幕上常见的那种干巴巴的说教型党委书记。“放心吧，导演！”秦怡暗下决心，“我一定不使你和观众失望，努力塑造一个生活中的党委女书记的形象。”

1964年冬天，秦怡随摄制组来到山西汶水县，他们首先参观了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当年曾亲眼见到刘胡兰英勇就义的壮烈情景，所以介绍这位青年英雄的事迹时声泪俱下，感人至深。秦怡边听边流泪，她从纪念馆出来的时候，眼圈仍然红红的。接着摄制组又来到汶峪河，参观即将竣工的大水库。秦怡在水库工地看到大批民工冒着凛冽的寒风，住着简易的工棚，吃着简单的伙食，把一车车土方和石块运往大坝。劳动强度之大，生活条件之艰苦，是自己想象不到的。秦怡发现，水库工作人员也很劳累。他们有时两天两夜得不到休息，天天和单调的土方、石头、炸药打交道。她感到当这里的党委书记，必须有魄力，还要有献身精神，否则将一事无成。于是，秦怡根据自己生活的积累，设计了水库工地党委书记钟叶平的形象：性格坚毅，办事果断，行动迅速，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在拍摄过程中，秦怡把握住钟叶平的这些性格特点，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领导水利工程建设的**女强人**的形象。

《浪涛滚滚》拍完了，秦怡感到钟叶平是她从影以来演得最满意的角色。可是，由于当时报刊上批判《北国江南》的风越刮越大，由于当时已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夜，这部影片尚未放映就被溺死在襁褓里！送进了电影资料库！直到成荫在1984年去世之后，北京电影学院在教学观摩时放映了这部影片，人们才发现秦怡演得那么好！电影学院立即派人找到秦怡，请她介绍在《浪涛滚滚》中塑造党委书记钟叶平这个人物形象的体会，并录了音。

《浪涛滚滚》是秦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1965年，秦怡准备接着拍摄故事片《乡村女书记》，可是全国农村的“四清”运动已经铺开，她和许多文艺工作者一起被派往上海市郊的川沙县农村，当上了“四清”工作队员。1966年，秦怡患直肠癌，住在上海医院动大手术，医院为她输了许多血。谁知血液带菌，她又染上了肝炎。接二连三的病患，使秦怡不得不在家休养了一年。但此时“文化大革命”的野火，开始在全国燃烧起来了。

7 沉沉黑夜的恶梦

1967年初春的夜晚，十几个穿着褪了色的黄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拿着藤条、鞭子、斧头和七

首冲进了秦怡家中去破“四旧”。他们翻箱倒柜，一个抽屉一个抽屉地搜查，可是很失望，这个“修正主义大明星”的家中，竟没有什么属于“四旧”的东西。他们又愤愤地把书架上的图书统统搯到地板上，对大部头的书一律用刀子划几道口子。当时正在病中的金焰躺在屏风隔开的床上，一切“接待”应付工作全得靠秦怡。

默立在一旁的秦怡实在看不下去，挺身对红卫兵说道：“你们为什么这么干？这不是革命行动！”

“什么？！”领头的小伙子一听“牛鬼蛇神”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如此不恭，一把抓住秦怡的领口，把她的头按倒在阳台窗口的外沿，厉声道：“你竟敢这么嚣张，不要命啦？”

秦怡毫不畏惧地大声辩道：“你们把《列宁全集》和《毛选》用刀划破，用斧头砍坏，这是忠于毛主席吗？这是革命行动吗？你们懂不懂政策？！”

红卫兵愣住了，未想到这个名女人这么凶。他们望着被刀划斧砍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敬爱的红宝书，面面相觑。红卫兵的头目松开秦怡，向室内的部下招招手，又冲到同院的另一些“牛鬼蛇神”——王丹凤、周小燕等其它艺术家家中去造反了。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象这样的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行动，在秦怡家几乎天天发生，持续长达一年之久。她被当作“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宠儿”而受到审查！她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为病中的金焰和全家人买烧饼油条作早餐，上班后就关在厂里一间小屋内反省，晚上十点才准回家。待她回到家中时候，总有些“造反派”等候在那里，无休止地纠缠、审问她。有一次，林彪“小舰队”的一伙打手们穿着军大衣、戴着白口罩，半夜突然来到秦怡家，盘问折腾到凌晨三点半才收兵。虽然她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但厂里有些老工人保护她，象配音演员乔榛这样的年轻人也经常安慰鼓励她，比起上影厂那些被“造反派”抓起来的著名演员，她还算幸运的呐！

1968年，秦怡和一批颇有名望的演职员，被送到上海少年教养所隔离审查，名为“监护”，实则坐牢。

在少管所，秦怡被隔离在一个劳教车间里写交待材料的时候，她奉行一个原则：讲真话，既不欺骗组织，也不欺骗自己，光明磊落，经得起历史审查。有一次，专案组提审秦怡，声色俱厉地问道：“你参加过国民党吗？”

“没有。”秦怡坦然答道，“解放前我参加过中苏友好协会和文艺界的抗敌协会，解放后参加了共产党，就是没有参加国民党。”

又是接二连三的发问，都被秦怡驳斥回去。

“你是最不老实的一个！”专案组的人看到一无所获，急得吼起来。

“我是最老实的一个！”秦怡针锋相对。

“你写的那些交待材料最没有价值！”



“我写的材料最真实了，没有一句假话！”

专案组的人恼羞成怒，于是抛出了“炮弹”：“你怎么解释你在重庆为国民党演《红玫瑰》？”

“我是演了《红玫瑰》，这个问题在1952年文艺整风的时候就作过检查了。组织上是清楚的。那时我才二十岁，是一个私人剧团到中艺借演员，我才去演的。可也是我站到台前，向国民党宣布第二天罢演的。在重庆，我接触了地下党员夏衍、阳翰笙等同志。我从没巴结过国民党，连国民党市长请我（堂会），我都不肯去见他！”秦怡滔滔不绝地摆当时的事实，据理力争，同时内心又感到委屈。作为一个弱女子，在年轻不懂事的时候，演过一出坏戏，而且很快就罢演了，如今却这样无限上纲没完没了地审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解放以来，你出国最多，拍的电影也最多，你还演了修正主义大毒草《北国江南》！”专案组又抛出一枚“炮弹”。

“我是演员，又是党员，出国、演戏都是组织分配的，我自己从来没有争过什么！”

……专案组的人轮番向秦怡出击，数落着她的“罪状”，审了三天三夜。秦怡坚持实事求是，从不瞎编乱咬。她每天都得打开“红宝书”，学习毛主席著作，

她越“对照检查”，越觉得专案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所以她同专案组始终顶着牛，处在对峙的地位。

秦怡在少年教养所关押了两年，于1972年出狱。她先到塘桥一座空寂的电影资料仓库去倒片子，接着又被送到座落在奉贤县海滩上的上海市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劳动。在干校农场劳动期间，别人都陆续“解放”了，秦怡却迟迟得不到解放。有一次，一名进驻上影厂的工宣队员惊奇地问：“秦怡同志，你怎么还没有解放啊？你没有什么问题嘛！”是的，经过专案组的内查外调，一切都很清白，很清楚。实质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张春桥对秦怡的案子，只讲了要审查，一直没表态可以解放。此事拖到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后，秦怡始在是年4月获得“解放”，成为受审查最早，“解放”却很晚的清白无辜的受害者之一。

“解放”了的秦怡，党籍可没有恢复。但在拍彩色故事片《征途》时，导演还是挑上她，让她参加拍片，并出任演员组长。当然，控制《征途》摄制组的，自然是“领导一切”的工宣队。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征途》摄制组当时已开赴东北，正住在哈尔滨市的北方大厦。秦怡从广播中突然听到这个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不敢相信。这位象慈父一样的总理，曾指引她走上革命文艺的道路，解放后几乎年年见到他，经常听到他的教诲和鼓励。“文革”开始后，她在逆境中是多么想念总理啊，想不到还未能见到他，他就这么快离开了人间。想到总理，想到过去的一切，秦怡心中哀痛不绝，她在房间里放声痛哭了一场！……

4月5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这场革命行动虽然遭到了“四人帮”一伙的残酷镇压，但消息传到正在祖国北疆拍片的秦怡耳中，她还是振奋不已。她深信苦难的日子即将过去，心中默念着英国诗人雪莱的著名诗句：“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8 早晨，她又拍了十一部故事片

沉沉的黑夜是白天的前奏，噩梦醒来是霞光万道的早晨。果然不出所料，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一场历时十年的民族大灾难终于结束了。秦怡在回顾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时写道：“当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到浦江两岸时，群众的激情象火山一样爆发了。我走在游行队伍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欢乐的泪水直往外淌。解放了，解放了，这一天终于盼到了！这个‘解放’的意义是多么深刻、伟大而又具体！”“我有幸活到了今天，能够看到‘四人帮’的垮台，能够看到党和人民的胜利。头上的白发无法拔掉，额上的皱纹无法抹掉，但蕴藏在我内心的激情象青年人一样燃烧起来。……”

解放了！在政治上、事业上、精神上都获得了真

正解放的秦怡，虽然已经年逾半百，却象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一样，活跃在新时期的舞台和银幕上！浩劫过后，忠实的观众们十分关心他们热爱的艺术家们的命运，希望能在舞台和银幕上听到他们的声音，重新目睹他们的风采。上海人民熟知秦怡，喜爱秦怡，各单位组织庆祝活动时，几乎都要邀请秦怡去表演节目。于是，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秦怡的生活节奏突然加快了，她的足迹踏遍了上海大大小小的礼堂和舞台。她在群众中用那微微沙哑的动听嗓音纵情歌唱，用那真诚而善良的心灵去咏诵，去呼唤，去赞美！有些青年人在周总理去世的时候，才幡然领悟到以前的“冲杀”多么愚蠢！他们发觉过去跟错了人，走错了路，于是他们决心痛改前非，在未来的生活中尽最大努力，报答党和周总理的培育，发愤为祖国的四化大业贡献全部力量。当秦怡满腔热情地在大学朗诵这个内容的长诗《我的青春》时，许多青年学生听着听着热泪盈眶，有的甚至失声痛哭！……

“秦怡还活着！”

“秦怡不见老，还是那么漂亮！”

听到观众欣喜的议论，秦怡感到慰藉。观众是演员的上帝。这个上帝没有忘记自己，说明自己过去的艺术劳动得到了承认，这个上帝是公正的！广大观众欣赏和评判着我们的表演艺术，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没有他们就没有演员的一切。因此，今后自己可以丢弃一切，却不能须臾把观众丢在脑后。

一个以事业为生命的艺术家，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是不会歇息的。从1978年她在影片《风浪》中扮演渔轮厂党委书记开始，这几年，她先后在彩色故事片《苦脑人的笑》、《海外赤子》、《张衡》、《倔强的女人》、《青山西照》、《雷雨》以及电视剧《上海屋檐下》等十部片子中，塑造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各种正面妇女形象。她端庄秀丽的仪表，深沉含蓄的表演，依然象青年时代那样富有魅力。

秦怡在拍摄《海外赤子》时已经五十七岁，爱人金焰病重，卧床不起，女儿有心脏病，儿子患精神分裂症，但为了塑造华侨妇女林碧云的形象，她还是毅然来到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体验生活。在这块竖着“天涯海角”石碑的富饶的岛屿上，她结识了许多海外赤子。一位通晓五国文字的归侨，历尽千辛万苦，从海外辗转回到大陆，却被“四人帮”的亲信胡乱塞到农场当会计。尽管受到怀疑和歧视，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工作，多年来没有记错一笔帐。“四人帮”垮台之后，他被某大学聘请任教，又高高兴兴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另一位受尽磨难的归侨，1965年从海外回国，翌年就被诬为“里通外国”，怀疑是帝国主义派遣的间谍，把他送到农场劳动。但这一切都没有能动摇他报国之志，他在农场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用汗水浇灌着祖国的青禾绿树，而今已当上农场领导干部。秦怡看到成千上万的归侨和他们的家属，从灯红酒绿的西方世界，

投奔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尽管在这海南农场劳动，却十分愉快，毫不后悔，从而对林碧云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当摄影机对准秦怡，拍摄林碧云一家在国内受“四人帮”党羽的迫害、有冤难伸的场景时，秦怡悲愤、委屈，泪水夺眶而出，演得真挚而感人。有人开玩笑地说：“瞧这秦老太，眼泪都是现成的。”

秦怡患直肠癌动过几次大手术，但《海外赤子》中有林碧云和丈夫黄德辉（史进饰）到长城游览的镜头。为了表现好这一对华侨夫妇向往长城，热爱祖国锦绣山河的兴奋心情，在北京的外景地，秦怡和摄制组的同事每天凌晨四点钟起床奔赴八达岭，每次去至少要攀登三次长城，有时还要爬到最高处的烽火台，让摄影机拍下林碧云与黄德华等人从长城顶上往下走的镜头。登长城的最初几天，秦怡累得腰酸腿疼，但她兴致勃勃，坚持攀登，到第五天才感觉自如，不那么累了，她高兴地咏起毛主席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

《海外赤子》在国内外放映后，在华侨中引起强烈反响。1981年秦怡到美国访问时，有些华侨主动上前热情地向她表示感谢和祝贺。福建侨乡在庆祝元宵节时，也忘不了特邀秦怡前往团聚，参加归侨的欢庆大会。华侨和归侨，都把秦怡当作自己人。

秦怡在电视剧《上海屋檐下》中扮演的三十二岁少妇杨彩玉，是她比较满意的角色，也是观众颇为赞赏的角色。杨彩玉是三十年代一个善良、温存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妻子，她全力支持丈夫从事革命活动，丈夫被敌人逮捕后，她养育孩子艰难度日，后来她误认为丈夫被敌人杀害，又同搭救她的丈夫的密友生活在一起。几年以后，丈夫在我地下党的营救下出狱，突然回到家中，此刻的杨彩玉惊讶，欣喜，百感交集……秦怡把这样一位处境艰难微妙，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的女性演得真实可信，把杨彩玉那跌宕起伏的情感和深沉复杂的心理刻划得淋漓尽致。这部电视剧由杨在葆编导和主演，秦怡担任艺术顾问，她能够按照自己的艺术追求去自由塑造杨彩玉的形象，这大概也是她取得成功的一个因素吧。

虽然秦怡扮演杨彩玉的时候年已花甲，但屏幕上的秦怡，依然肤色细润，光彩照人，仿佛流逝的岁月并未夺去她的青春。确实，她和其它几位著名女演员一样，曾在上海做过美容术，但这也招架不住把年岁暴露无遗的特写镜头。为了缩短角色年龄上的差距，她采用了文艺界日本朋友热情赠送给她的化妆品。在拍摄杨彩玉回忆少女时代的特写镜头时，秦怡梳的是童花头，用的是日本著名电影演员高峰秀子送的头套和日本著名戏剧家杉村春子送的胶布，再加上中国化妆师和摄影师高超的化妆和灯光摄影技术，一个楚楚动人的姑娘杨彩玉的形象终于留在了荧屏上。秦怡不仅塑造了彩玉崇高美好的心灵，而且赋予她优雅娟秀



的仪表，使得这个人物形象表里一致，给人以强烈的美感。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战士的眼睛，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秦怡深深喜爱郭小川的这几行著名诗句；这铿锵的诗句也恰恰为秦怡在“四人帮”垮台后几年间留在舞台和银幕上的美好形象，作了精神的注释。呵，秦怡，我们可敬的电影艺术家！……

9 来自总理与大姐的关怀

1982年5月，樱花盛开的时节。日本京都岚山的周恩来总理诗碑，在春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雄浑、庄严、高雅。由司徒慧敏率领的中国电影代表团来到这里参观时，团员们纷纷站到敬爱的周总理诗碑前合影留念。只见秦怡走到一边，对随行的摄影记者说：“请你单独为我照一张，我准备把这张照片带回去送给邓大姐。”于是，秦怡婷立在诗碑前的花丛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纪念。

自从四十多年前，周恩来同志在重庆鼓励秦怡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之后，他和邓颖超同志一直象关心女儿一样，关怀着秦怡的成长。有一次秦怡在歌乐山养病，她的病房恰巧在周恩来同志的病房前面。穿着旗袍的邓大姐去探望周恩来同志时，总要拐到秦怡的病房里同她攀谈。邓大姐那和蔼可亲的态度，那真挚暖人的话语，秦怡至今想起来心里还是热烘烘的。

在重庆，周恩来在郭沫若等陪同下，经常去看秦怡演戏，而秦怡也常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听周恩来副主席作形势报告。当时周恩来副主席的警卫员、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龙飞虎将军，现在看到秦怡同志时还说：“这个姑娘十八岁时，

我就认识了。”

建国以后，秦怡不仅是著名电影艺术家，而且是全国政协委员，她经常到北京开会、拍片或出国集训，几乎年年能见到周总理，经常得到总理的关怀、鼓励和教诲。1957年我国举行亚洲电影周期间，在一次招待会上，周总理正好坐在秦怡的旁边。总理关心地问：“飞飞怎么样？现在还吐不吐？”飞飞是秦怡的女儿金斐姬的乳名。四十年代初期，秦怡在重庆时身体单薄羸弱，剧团的同志都叫她“干面包”。她生下飞飞后没有奶喂，就给女儿请了一位奶妈。不知为什么，孩子依然瘦的可怜，胃也不好，到两岁时还经常呕吐。那时候，周总理在一个朋友家看到那个奶妈抱着皮包骨的孩子，一问才知道是秦怡的女儿。时隔十五、六年，秦怡看到总理不仅记得女儿的乳名，还惦记着女儿吐不吐，顿时感动得眼圈红了。

周总理看到秦怡拍了象《青春之歌》之类的好片子时，总是高兴地予以肯定和鼓励，希望她多拍这样鼓舞人民前进的影片；而看到影片的不足时，又会及时帮助秦怡作全面分析。1960年，周总理看了《摩雅堡》后对秦怡说，这部电影内容很好，拍得不错，但在影片中穿着坎肩，有点象维吾尔族人，不大象傣族姑娘了。傣族妇女在做姑娘的时候，一般是很瘦的，你穿着坎肩显得有些胖。1961年，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的一次舞会上，周总理对秦怡说：“你在重庆演的《野玫瑰》我看过，那个戏政治内容不好，但你的演技还是很好的。”1964年，秦怡主演的《北国江南》，遭到全国各家报刊的批判之后，秦怡心中十分苦闷。周总理在北京见到秦怡时，说道：“不要怕批判，批判可以使人前进，认识问题嘛！”周总理送给她一张观摩大型歌舞《东方红》的入场券，鼓励她说：“去看看吧，不要灰溜溜的，要精神焕发。”1965年，周总理听说秦怡在《浪涛滚滚》中扮演一名水利工地的党委书记，心里非常高兴。在摄影棚，总理考问秦怡：影片中的这个工地，是以发电为主，还是以拦洪为主？拦洪坝有多长？多宽？下面是流沙还是砾石？……总理问得很周全，秦怡答得也很详细。最后，总理满意地说：“你演这个党委书记还可以。”

1966年，秦怡患直肠癌在上海动了大手术，周总理和邓大姐在北京闻讯后，特地写信给秦怡表示慰问。邓大姐在信中勉励道：“一个共产党员应面对现实无所畏惧，对疾病也是这样，去斗争，去战胜它。”秦怡对总理和大姐的关怀十分感激，她后来撰文谈到这封信时写道：“邓大姐的话永远铭记我心中，使我相信这不仅对疾病，而且对一切都应这样。‘四人帮’给我们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时，我反复地默念着邓大姐的话，我坚信‘四人帮’一伙终有垮台的一天。”

周总理去世之后，秦怡特别想念邓大姐。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期间，有一天她接到通知，邓颖超同志邀请她下午到家中作客。“大姐叫我！”她怀着急